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读书周刊

中国教育报文化副刊中心
微信公众号：中教文化乐读

2018年7月2日　星期一
中国教育报 09

主编：王珺　编辑：却咏梅　王珺　设计：聂磊　校对：张静　电话：010-82296621　邮箱：dushuzhoukan@163.com　QQ群：226839819

封面·话题

走向真知的思辨性阅读：必由之路

余党绪

回到文本

2017版语文新课标提出了“思辨性阅读与表达”学习任务群。那么，什么是思辨性阅读呢？思辨性阅读是一种阅读方式。阅读的目的与诉求不同，方式与结果自然也不一样。有的阅读是为了消遣取乐，或者满足个人趣味，这样的阅读强调个体的兴会和悦纳，自由度大，个体差异也大，人们津津乐道的“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主要就是针对这种阅读讲的。

思辨性阅读则不同。它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真知，或者为了解决问题，个人的好恶与体验都要退居其次，阅读的准确性、明晰性与合理性，则成了判断阅读效果的首要标准。当然，思辨性阅读并不排斥个体的感受与个人的趣味，但在承认“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同时，更要追求“最哈姆雷特”（赖瑞云《多元解读与文本中心》）的理解。这就要求读者的思维始终处在“思辨”的理性状态，自觉地分析与论证，审慎地权衡与判断。思辨性阅读，正是批判性思维的用武之地，我们也不妨将它称为批判性阅读。

文本是思辨性阅读的根基。美国文艺理论家M.H.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了文本解读的两条路径，一是直面文本，一切关于文本的断言与结论，都必须以文本为依据；另一种则是通过文本与作者、读者或者环境的“关系”来间接地解释作品。比如作家，作家是作品的生产者，借钱钟书式的幽默来表达，研究母鸡也能认识鸡蛋。但事实上，母鸡不等于鸡蛋。种种原因，譬如环境的压力，或者自我秉性的影响，或者风格的追求，都会让作家的创作动机在作品中发生“变形”，因此，研究作家并不一定能达成关于作品的真知。

间接的“关系”研究还得经受直接的文本解读的检验，文本是思辨性阅读的基石。陈思和先生说，对文本要有一种“信仰”，强调的也是这个意思。

实证与分析

尊重文本，知易行难。文本似迷宫，其意蕴与逻辑并不会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而是隐藏在文本之中，等着读者去挖掘。迷宫里歧路纵横，浮云蔽日，走着走着，恐怕连自己都会走丢。干扰我们的因素很多，语言自身就是其中之一。语言是桥梁，是工具，这个道理人所共知；但语言又常常成为沟通与理解的障碍，成为横亘在我们与文本之间的一堵墙。

譬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秦王”，在文中，这是一个面目模糊的人物。如果对他一无所知，对他的理解就会走向脸谱化。

如果不先入为主，仅就“完璧归赵”一节看，这个秦王看起来倒有点虚弱与怯懦，至少表面如此。你看，蔺相如在朝堂上斥责秦王倨傲轻慢，要求他举行一个隆重仪式来交换和氏璧。面对咄咄逼人的蔺相如，秦王没有暴跳如雷，而是满口答应。等到秦王布置好了场面，蔺相如却派人把和氏璧送回了赵国，还公然指责秦王祖宗八辈都是背信弃义之徒。应该说，这一轮倒是蔺相如自己说话不算数了。设身处地站在秦王的角度想一想，他能不恼火吗？但秦王的反应也只是“与群臣相视而嘻”，不仅没杀蔺相如，还好生款待他。蔺相如疾言厉色的痛骂和诓骗式的手段，连明朝的王世贞都看不过去了，他说：“令秦王怒而戮相如于市，武安君十万众压邯郸，而责璧与信，一胜而相如族，再胜而璧终入秦矣。”意思是，你这样激怒人家，人家杀了你也在情理之中！

很多人由此作出“外强中干”的断言。其实，教科书对秦王的介绍也大多如此，但历史上的秦昭襄王并非如此粗鄙与虚弱。秦昭襄王，19岁继位，在位56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王之一。据历史记载，秦昭襄王“明而熟于计”，城府很深，有忧患意识。他起用范雎、白起等文臣武将，采用“远交近攻”的军事战略，各个击破，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完璧归赵”这一年，秦昭襄王42岁，在位已23年，无论是看年龄，还是看其政治履历，都已经是个成熟的君王了。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面对区区一个蔺相如，怎可能表现得如此不堪？显然，外强中干的判断难以立足。

懒惰是思维的本性。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秦昭襄王，被我们简称“秦王”之后，这个语词就成了一个空洞的概念。历史上，秦国暴政常常作为儒家仁政的对立面被表述，“秦王”也被抽象成为丑恶残暴的化身。显然，这个“知识”妨碍了我们对秦昭襄王的具体理解与评价。

语言总是通过我们自己来遮蔽我们的。思辨性阅读，必须穿过语言的雾霾，厘清文本的事实，理清文本的逻辑，这就需要实证与分析的功夫。实证与分析看起来是两个范畴，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事实的认定，必须借助逻辑分析的力量；而逻辑的思辨呢，又必须建立在事实的辨别之上。如果断定秦王是虚弱的，那么，秦国的大国地位怎么解释？秦昭襄王的雄才大略又体现在哪里？显然，事实的认定出现了逻辑破绽。

秦王的“虚弱”意味着什么呢？是道德上的自惭形秽，还是国力上的自愧不如，或者另有所图，隐忍不发？我的推断是后者。在我看来，以十五座城池交换赵国的和氏璧，本来就是秦王的讹诈与试探——秦王原本就没想打这个仗。倘若秦王已经下了开战的决心，一个和氏璧岂能阻挡他的战争步伐？更何况蔺相如还诓骗了他，等于给了他名正言顺的杀伐借口。秦王“明而熟于计”，恰恰就表现在这里：不管你蔺相如怎么挑逗与刺激，我自方寸不乱。这哪里还是怯懦和虚弱呢？实证与分析是思辨性阅读的基本功。

论证与反驳

挖掘事实，逻辑分析，说到底都伴随着一个论证与反驳的过程。对理由的拷问，对结论的反思，对理由与结论的关系的推敲，这就是论证与反驳。

人是理性动物，也是需要理由的动物。理由常常由圣经贤传、生活经验、格言警语和公共知识组成。理由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自以为是”，且喜欢“推己及人”，比如“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说多了听多了，它就会从一个普通判断摇身一变，成为不证自明的“理由”；一旦遇到合宜的人物或场合，它就会冒出来参与我们的推论与判断。我在教《促织》时问学生，主人公成名的命运究竟是什么决定的呢？好多学生破口而出“性格决定命运”，将成名的悲剧命运归结于其性格。合理吗？想一想，这真是一个既荒唐又危险的“理由”。成名本分迂讷，同样是当差，人家借此敲诈勒索，而他胆小怕事，搞得家破人亡。如果据此认为他的悲剧命运是由其性格决定的，岂不是鼓动人们要见利忘义，不顾廉耻？显然，“性格决定命运”这个判断并不适用于成名。成名的悲剧是社会悲剧，而非性格悲剧，是邪恶而荒唐的社会让这个老实巴交的人倒了大霉，又走了大运，一切都莫名其妙，一切都不可把握。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迂讷”的人也有权利追求正常而有尊严的生活，因“迂讷”而遭受了悲剧的命运，肯定是这个社会有问题。

原来，“性格决定命运”这个判断本身就有缺陷，理由错了，结论自然也会跟着错。反思结论与理由的关系，是一个论证与反驳相呼应的过程，这正是思辨性阅读的核心。

回到蔺相如。司马迁赞赏蔺相如，说他智勇双全，公忠体国。但基于不同的理由，有人的评价则大相径庭。王世贞对蔺相如的行事逻辑就完全不能接受。他说，因为担心秦国找借口打仗，赵惠文王才担着风险让蔺相如去做和平使者，但蔺相如似乎忘记了出使的初衷，他主动进攻，步步紧逼，屡次冒犯秦王，激化矛盾，究竟意欲何为？王世贞质问道：“奈之何既畏而复挑其怒也？”老虎本来要吃人，你还要去捋虎须，实在不明智。在他看来，蔺相如的“完璧归赵”，完全是一场撞大运式的侥幸成功。

王世贞的话不无道理。其实，在出使秦国之前，蔺相如与赵王制定的策略，是先保国家安全，再考虑和氏璧。这是一个正常的逻辑：和氏璧与国家安全，孰轻孰重，世人皆知。宋朝的杨时——就是那个“程门立雪”的好后生——就说道：面对虎狼之国的威胁，一块宝玉算什么？为了和平，给他也无所谓。但蔺相如的逻辑似乎不是这样，“乃以孤单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庭当车辙之势，其危如一发引千钧，岂不殆哉！”特这种批评态度的，还有宋人司马光。他说，和氏璧就是个有它不多没它不少的玩意儿，蔺相如竟然“以死争之，以诈取之”，似乎比国家安全还重要，实在不可理喻。南开大学教授徐江更尖锐，他说蔺相如“轻率、无理、无礼，罔顾赵国的安危，损害赵国的国格，眼中只有那块和氏璧，根本没有战略眼光”。厌恶之态，跃然纸上。

在批评者看来，作为一国之使者，蔺相如应该懂得轻重缓急，应该知道如何进退，但他却主动撩拨秦王。最糟糕的是，亲口答应了交付和氏璧，却又偷偷派人把它送走了。那么，你当初带它来干什么呢？放在赵国不是更安全吗？……诸如此类的矛盾，还有很多。不能不说，这些质疑和反问都击中了事情的要害。那么，蔺相如的成功到底靠他的智勇，还是靠运气？如果靠的是运气，那么，蔺相如的智勇就值得怀疑了。

思辨是在反复的质询与反驳中达成的。不妨对上述质疑再来一次质疑：将“完璧归赵”归结为运气，这样的历史解释能否让人信服？蔺相如如此撩拨秦王，秦王为什么却没杀他？为什么莽撞轻狂的蔺相如竟然能不辱使命？如果蔺相如如此不堪，那司马迁的历史眼光是不是存在严重问题……

若将蔺相如走钢丝式的政治博弈看作是一次纯粹的运气，那么历史研究就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运气永远是蒙昧历史学的说辞。如果不是运气，那么，“完璧归赵”的讨论就必须回到当事人身上，是当事人造就了这段历史。其实，当初蔺相如还是宦官门客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了非凡的政治远见；在此后的渑池会、将相和等事件中，他的政治胆识和政治操守又得到了更加耀眼的展现。就是这样一个蔺相如，难道偏偏在“完璧归赵”这一事件中脑子进水了？显然，这样的理解有违文本的内在一致性。我们有理由认为，上述对蔺相如的批判，仅仅停留在事件的表象，而未能深入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真实。

如果蔺相如不是莽夫，那么，我们只能推断，蔺相如的莽撞只是表象。他一改唯唯诺诺、仰人鼻息的弱国姿态，以攻为守，高调宣示，以激进张扬的方式，来阻止秦国的野心，灭秦国的威风。看起来风险很大，实际上他心中有数，进退有据，抑扬有度。

这样，问题就转化为：蔺相如为什么要选择这一策略？原因很复杂，但有两点是可以在文中找到依据的。首先，蔺相如有冒险的胆量和动机。我曾撰文说，蔺相如出身卑微，梦想改变自己的草根地位；作为战国士人，他对功名充满着热望，这让他敢于冒险，不走寻常路。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秦昭襄王没有任性使气，没有丧失理智。他认识到，“今杀相如，终不能得璧也，而绝秦赵之欢”，反而做了个顺水人情。秦王把“秦赵之欢”看得很重，可见他是个理智而隐忍的君王。我相信蔺相如看到了这一点，否则，他不是去白白送死吗？

蔺相如的胆源于他的识。他洞悉大势，对秦赵的国力对比了如指掌；他明察秋毫，对秦王的喜怒心态洞若观火。他判断，秦有吞赵之心，却暂无动兵之意；他清楚，纵然危机四伏，秦王也不会轻易砍他的头。政治不是儿戏，归根到底，角逐的是国力，是利益，是国策，是时机。蔺相如的胆识非一般人可比，所谓艺高人胆大，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没有本钱，谁敢拿生命冒险？但有时，胆大者艺更高。有了赴死的决心，倒反过来促成了他的大开大阖。

回到历史现场，上述这些推断都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找到蛛丝马迹。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绕了一圈，结果还是确证了司马迁“智勇双全”的判断。这说明，司马迁达成了事实与逻辑的统一。倘若文本中存在着事实与逻辑相矛盾的地方，即便是司马迁，我们也一样有质疑和批评的权利。

论证让我们有了判断力。康德说，人生所有的实践和阅历，都不过是在训练自己的判断力。思辨性阅读，能够造就更锐利的眼睛和更睿智的头脑。

（作者系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思辨读写”与“公共说理”的倡导者与实践者）

书海观潮

“葵花”六载今盛放

相信种子的力量

本报记者　王珺

一个名字，代表了一份心愿，一个象征。许多新教育的教师都会为自己的班级取一个名字，把自己和孩子的梦想融进这个名字中。

6年前，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教师郭丽萍将自己带的一年级班级命名为“向日葵班”，从此，开始了带领孩子“向着明亮那方”的前行。6年来，郭丽萍在“向日葵班”坚持以晨诵开启一天的美好生活，在全学科的共读、共写中为孩子的人生奠基，开发“儿童讲堂”课程，锻炼学生的演讲表达能力，探索家校共育、形成教育合力。经过6年的实践，“小葵花”们取得的进步与成绩令人感叹：全班40名学生共有30余篇文章公开发表，区级以上获奖160余人次，在演讲、科技、信息技术等市级、国家级比赛中获奖证书百余张……6年来，这位普通的教师也交出了一份同样不普通的成绩单：先后获得海淀区“世纪杯”评优课一等奖、学科带头人评优课一等奖，北京市阅读教学评优课一等奖，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等，她编著的《和学生一起成长》《一间小教室、十个大行动》《长翅膀的课程》等著作也陆续出版。

在骄阳似火的6月，孩子们迎来了毕业典礼。这是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郭丽萍带领她的“小葵花”们以生命叙事的形式向前来参加“海淀区新教育成果展示交流会”的嘉宾展示了他们6年的成长与收获。

“向日葵是一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植物。虽然普通，向日葵却有大大的梦想，那就是永远向着明亮的那方。”新教育实验发起者朱永新教授在致辞中这样诠释“向日葵班”的含义。他每学期都会来到这个班级，和孩子们、郭老师以及其他任课教师一起交流，所以，他对这个成长中的班级有更多的了解。

他告诉记者，郭老师非常普通，她曾经是北京的一名乡村教师。她自己也常常说，她不是特别有灵气的教师，不属于那种一点就通才华横溢的人。在教室里的这群孩子，也是普普通通的孩子，而学校也不是北京最牛的名牌学校，班级的学生并没有经过挑选，基本都是随机编班。

“他们就是一株株普通的向日葵，站在教育的广袤田野里，几乎没有人能够认出他们，但是，当一朵花真正以自己的命名为使命，就会看见不一样的阳光，绽放不一样的美好。6年来，每学期我都会来到这里，看看向日葵生长的情况，参加他们的期末庆典。每一次，我都看见向日葵的拔节，看见他们朝向阳光的努力，看见他们变得越来越美丽的模样。”看着这群绽放生命光彩的孩子，朱永新难掩欣慰与诗情。

海淀区自2012年加入新教育实验以来，涌现出一批优秀学校与教师，首师大附小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校校长宋继东说，新教育激发了教师的职业热情，丰富了学生的校园生活，让师生在共读、共写、共演中逐渐过上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谢谢了，我的家》展现中华传统家风

本报记者　却咏梅

《谢谢了，我的家》是2018年初中文国际频道推出的一档全球华人家庭文化传承节目，以海内外54个家庭的故事串联起中华传统家风的脉络，节目以朴实的表达、深情的回忆赢得了全球华人的美誉。近日，同名图书《谢谢了，我的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京首发。

该书将54段电视节目分为“为国为民”“矢志不移”“谋时而动”“言传身教”四大版块，并增加了古诗文经典，追根溯源中华家风。图书将访谈的对话体改为故事体，并采用了AR技术，108张图片对应了800分钟视频，每张图片都链接了相应的电视视频片断，生动全面地呈现了中国家庭教育精华，多层次展示了中国家风深厚底蕴。

新书发布会分为“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三大环节。齐白石大师的孙女齐慧娟展现了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家庭，她在现场泼墨画虾，不仅讲解了如何画出逼真的虾，更提醒大家要活得透亮；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创始会长耿瑩回忆了父亲耿飚将军对自己的严格教育，现场以一段珍贵视频缅怀前辈，倡导传承家风中的红色基因。另外，孔子第七十七代孙孔德墉现场讲述了孔府“诗礼传家”的小故事。

臧永清社长表示，出版这本图书的初衷是出于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责任，动机是认识到这些平凡故事中的文化性和教育性，目的是为读者奉上一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神食粮。

最新书事

大学教材资源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座谈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却咏梅　杨三喜）“大学不知道选用的是不是优秀教材、出版社无法搞清楚产品流向……在传统大学教材领域，由于终端用户数据不精准，大学、出版社和经销商各自控制成本，其结果只能是互相转嫁成本的零和游戏。”在近日举行的新时代大学教材全要素资源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座谈会上，山东畅想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CEO夏波对此表示，解决“供给侧生产和服务能力不足”“端到端的脱节”“无效的数据和流量”“全产业整体生产效率低下”等问题是当务之急。

来自高等教育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等30多家出版社代表以及高校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围绕畅想谷——大学教材与数字资源精准服务平台建设，从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教育出版、产业融合和协同发展等多维度进行了深入探讨。大家一致认为，该平台通过网络协同和数据智能，为用户提供了精准服务整体解决方案，实现了教育、出版、管理、服务的大数据共建和共享，在促进大学教材产业转型和服务升级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我与书房

书房变迁记

周维强

常常会见到一些媒体撰文批评说，中国的家庭没有多少藏书或者没有书房。这些意见不是没有依据，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我总疑心说这些话、写这些文章的，好像是从火星上移民过来的。

一个家庭如果要有一定数量的藏书或者书房，那必须首先得有比较宽裕的住宅，否则藏书往哪儿搁啊？或者说，书房的存在，还是得依赖于住房的改善。我曾经在住宅里有比较宽大的书架，后来又有了比较宽大的书柜，再后来又有了一个书房，从书架到书柜到书房，说来也真是侥天之幸。

30多年前，大学毕业，那时住房没有市场化，都由所工作的单位给予分配，僧多粥少，所以有房子的单位一般会成立一个分房小组，制订分房标准，比如工龄、职称等，按照标准给申请住房的职工打分，由高分到低分分配住房。那时的房子的面积之小和结构之单一，也不是现在的年轻人所能想象的，比如一个业务单位，初级职称只能分到小套，大约三四十平方米；中级职称可以分到中套，五六十平方米；高级职称才有条件分到大套，70平方米。以30多年前这样的住房标准，房间里哪还有多余的空间来放书啊？能够有一个书架算是幸运了，更遑论书房了。

婚后参加单位的分房，一开始分到了小套；1998年评上高级职称，单位给补足了住房面积，但两套房子在城市的两端，使用起来不便利，所以住了一段时间后，还是和太太一起搬回到了岳父母的住宅。虽然岳父母的住房还算大，但是想要有书房就没有多余的空间了。不过我能够有一个比较大的书架可以来放书，是托了太太的福，所以我说这是侥天之幸。

1998年房改开始了，住房面向社会开始了一个市场化的过程。我所在的城市那时在世贸中心举办了一次房交会，我和太太在会上一眼就看上了一个文教区的楼盘，其中主力户型是120平方米。这个地方学区好，距离西湖又近，所以我没有丝毫犹豫地下了订单，2002年暑期结束后，全家搬进新居。新居虽大，算来算去还是少一个书房：厨房、两厅两卫、孩子的房间、岳母的房间（岳父已经去世）、我们的房间，书房是没有了，好在厅足够大，所以大大的客厅里站立着一排巍峨的大书柜——比原先的书架扩大了许多倍，已经很知足了。

然而，2003年春天，记得获知“非典”那天，我正和杭州的几位特级教师、知名校长在青田“支教”。平生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疫情，那时我也有点儿紧张甚至“惶恐”的感觉，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了。傍晚回到杭州，听说有学校发生了“非典”疫情，我所居住的小区，有个单元也发生了“非典”疫情，这个单元整个地被封闭了。这时候，我和太太觉得，住在热闹的市区，人口密度高，也有“不安全”的因素，生出了到郊外购置房产的念头。

也是碰巧，那时获悉我所在的城市在规划着把城西的湿地建成湿地公园。我看了规划，全家又到那儿去走了走、游了游。更碰巧的是，一家房产公司在那儿开出了楼盘，楼盘广告说是“纯排屋社区”。真是喜出望外！

2003年春天的一场“非典”，触动我家生发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好结果，而我也终于意外地得到了一个书房。

今天，我坐在明亮的书房里看书或写作，或整理书籍，总会生出一丝庆幸，庆幸遇上了一个经济发展的时代，一个有可能改善住房条件的时代；而那时候的房价，也还是我们的收入能够承担得起的。真是侥天之幸啊！

仓廪实而知礼节。一定的精神文明恐怕也得建立在一定的物质文明的基础之上。与其指责国人不重视家庭藏书、没有书房，不如想办法改善住房条件才是富于建设性的、务实的做法。如果有这么一天，书房成为城市“中产”住宅的标配，这将是我们城市文明的一个多大的进步啊。

行文至此，忽然听闻我所在的城市，购买住房也要“摇号”了——这意思是说，房改20年，我所在城市的住宅仍然是“稀缺资源”，供不应求啊——当然，从好的方面来理解，这或许也说明了这个城市的人民比较富裕和对美好生活品质居所的向往与渴求。

书房，书房。

（作者单位：浙江教育报刊总社）